

# 我看中共的現代化

尹慶耀

中共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叫得很響，引起了國際間的相當注意。要求現代化本來沒有什麼不對，中共目前也認真在推行，這對內對外都還可能發生一定限度的統戰效果。但僅有這些，並不能保證它的成功。從「一窮二白」到「走在世界前列」，究竟不是一件簡單而容易的事！對於這樣一個重大而複雜的問題，決非一兩篇文章所可探討無遺。本文僅略抒門外漢的管見，以就教於讀者。

中共四個現代化問題的提出，是有着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程的。這個構想，始見於一九六一至六二年毛澤東的「蘇聯『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他要求到一九七二年、爭取提前到一九六九年，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的現代化<sup>①</sup>。毛初提時正值「大躍進」失敗，繼之以連續三年大災害之際，對現代化當然是有心無力。

一九六四年時，中共經濟略趨穩定。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召開三屆「人大」，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根據毛的指示，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開始，經濟發展按兩步設想的現代化步驟進行。可是，一九六五年末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弄成經濟的大倒退，現代化也只好束之高閣。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來在四屆「人大」重提他的兩步設想，雖然距前次已事隔十年，却仍然是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算起。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共的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他還說，「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制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並指出今後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sup>②</sup>。同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以「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為標題的社論，激進的文革派以「反修防修」來對抗現代化，此後又發展為「反右

註① 中共編印之「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四五—三四六頁。

註② 俱見周恩來在中共四屆「人大」之「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傾翻案風」與「批鄧反右」，終至爆發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

一九七六年在中共是重要的一年，有周恩來死亡（一月）、鄧小平第二度垮台（四月）、毛澤東倒斃（九月）、四人幫被捕（十月）等事件。此後是文革派分裂，鄧小平再度復出。中共於一九七七年八月舉行「十一大」，一九七八年二月召開五屆「人大」。華國鋒在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了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由於「四人幫」的支持、包庇和縱容，壞人當權，工廠停工停產，農村分田單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盛行，階級敵人活動猖獗，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局面<sup>③</sup>。

正如同「兩報一刊」社論所說，中共在二十八年來（五屆「人大」當時），「國民經濟幾度徘徊不前，科學技術水平同先進國家的差距縮短了，又拉開了」<sup>④</sup>。儘管如此，五屆「人大」不顧時間的蹉跎和現實條件的倒退，仍然把現代化作為其「新長征」的重大部署，其實現的期限仍為公元兩千年，其「十年規劃」也仍然是截至一九八五年止，而周恩來所謂關鍵的十年，也就只有八年（五屆「人大」當時）了。單祇這一個提法，就含蘊着不少問題。

## 二

在上述情況下，我們看到中共報刊再度強調發展「速度」，是不會驚奇的。本來，在羅斯陶(W. W. Rostow)教授的經濟史觀中，有一個「起飛」階段，那是要經過相當的準備時期，在相當的基礎上，具備相當的條件，才能達成的。缺少了這些，只是在主觀要求上從事「躍進」，那就相當危險了。

中共自六〇年代以來，即不發表經濟統計數字，只在一九七〇年爲了向美國招手而邀史諾(Edger Snow)往訪中國大陸時，周恩來才向他透露了一些含混的數字。如果據此而推算其每一年度的生產數字，那是相當危險的。而且，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估計的結果，和中共在五屆「人大」等場合所透露者頗不相符。還是讓我們看看中共自己的說法罷。

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會中講到中共現今的生產技術水平時說，大陸「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真正過關。每個農業勞動年平均年產糧食，我國不過二千斤上下，美國是十多萬斤，相差幾十倍。我們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率也只有國外先進水平的幾十分之一。新興工業的差距就更大了。在這些方面不用說落後一、二十年，即使落後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sup>⑤</sup>。同年九月，蘇聯廣播中引述中共「光明日報」的資料說，中共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世界

註③ 華國鋒在中共五屆「人大」之「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六日）。

註④ 中共「兩報一刊」（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六日）社論：「繼續長征的重大部署——熱烈祝賀五屆人大和五屆政協第一次會議開幕」。

註⑤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三月廿二日）第三版。

水平低九八·九%，農業工作者的勞動生產率比先進國家農業工作者低九八%<sup>⑥</sup>。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香港「文匯報」在「學時事」專欄中曾經指出，中共的社會生產力正面臨着艱巨的任務。農業基本上還停留在手工業時代，農業機械化與世界先進水平比，差距不小，勞動生產率差距更爲突出。例如小麥每畝總工數，美國平均不到半小時，法國只有一點七個工時，而中共大約需要八〇至一〇〇個工時。據報導，一九七五年美國每一個農業勞動力每年平均生產糧食一三萬多斤，可供養五十六人，全國每人平均佔有糧食二、〇〇〇斤。中共工業方面，手工勞動仍然佔着相當大的比重。比起世界上工業發達的國家，中共工業無論從生產規模上、技術水平上，都還有很大差距。就生產規模說，中共的基礎工業，如鋼鐵、煤炭等等，生產的數量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新興工業部門，有的還在開始建立，有的還在試驗階段，與工業現代化的要求很不相應。從技術水平來說，多數企業設備陳舊，體力勞動在生產過程中還佔相當大的比重。因而勞動生產率低，燃料、原材料、動力消耗大，產品質量不夠穩定，綜合利用更差<sup>⑦</sup>。

中共經濟「以糧爲綱」、「以鋼爲綱」。一九七八年中共糧食產量自己的說法也不一致。最高數爲五、九〇〇億斤左右（二億九、五〇〇萬噸左右，在中共自稱遭遇一五〇年來未有的大旱災的當年能有如此收成，很難令人置信），未達目標<sup>⑧</sup>。若以中共一〇億人口平均計算<sup>⑨</sup>，每人只分佔五九〇斤（二九五公斤，若以九億人口計，當較此數爲高）。中共報刊經常嘲笑蘇聯的農業失敗，然一九七八年蘇聯穀物收穫二億三、五〇〇萬噸，其總人口僅二億六、〇〇〇萬。如果考慮到蘇聯人民還有肉類與牛乳等供應，而中共則係以穀物爲人民的主食，則雙方差距更大，雖然蘇聯在食生活方面還遠遠落後於西方。據「新華社」報導，大陸黃土高原的生產及生活水平，至今仍低於「解放」初期<sup>⑩</sup>。這情形可就嚴重了！中共「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保證農民富裕起來。現今要給地主富農摘掉帽子，對農民作出種種讓步。可是，要建立起所謂科學化的農業制度，僅僅那些讓步是不夠的。

### 三

中共的鋼鐵生產，自稱去年已突破三、〇〇〇萬噸<sup>⑪</sup>。那用人口平均來計算，是少得可憐的。提到以人口平均計算的數量，

註⑥ 「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九月廿日）報導。

註⑦ 香港「文匯報」專欄「學時事」第九〇八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日）第十二版。

註⑧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七日）第一版。

註⑨ 一九七七年九月美國家庭計劃團體訪問中國大陸時，中共當局告知大陸人口九億五千萬，現當已接近十億。

註⑩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一版。

註⑪ 中共「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透露。

這裏有兩項資料都是值得參考的。

附表一 各種重要產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產量的比較 (1977)

	中 共	全 世 界	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為中共之倍數
電力(度)	122	1,528	5,980	49
石油(公斤)	54		792	14
鋼(公斤)	31		634	20
糧食(公斤)	270		627	2強

來源：香港“展望”雜誌(1977年12月1日)21頁。

附表二 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經濟情況(按人口平均)比較 (1978)

	臺灣地區	中國大陸	前者為後者之倍數	備 註
平均每人所得(美元)	1,304	198	6	大陸係連進口量計算
糧食消費(公斤)	630	334	約 1	
鋼品(公斤)	210	33	約 7	
石油(公斤)	1,125	48	13餘	
電力(度)	2,022	150	13餘	
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	237	192		大陸少45億餘
按人口平均貿易額(美元)	1,394	21	65	

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張光世報告數。又1978年中共自稱為形勢大好。

上引「展望」雜誌資料指出，假使全世界的生產都裹足不前，只有中共單獨增加，它要在公元兩千年時趕上一九七七年的世界水平，其全國收入就要由每年的一、一七〇億美元，增加到一三、〇〇〇億美元。假如美國由現在至兩千年時期內經濟發展停止不前，中共要趕上它，就要增加自己的國家總生產三〇多倍。要是美國在這個期間內，每年增加它的財富一%，中共又要再增加它的每年生產量一〇倍。

從上述情勢看來，中共是從很低的基礎上起步，但顯然不能從那樣的基礎上「起飛」。

中共目前致力的是已經虛渡了十年的十年經濟規劃。照華國鋒在五屆「人大」報告中的說法，在一九八五年以前，中共要在大陸新建和續建一二〇個大型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

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和五個重點港口。到一九八五年，糧食產量將達到八、〇〇〇億斤，鋼產量六、〇〇〇萬噸。從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間，農業總產值每年要增長四—五%，工業總產值每年要增長一〇%以上。



這個規劃看起來是冠冕堂皇的，問題是如何能達成。依據美國國會較高的估計，中共農業生產率每年要增長三%以上是困難的，蘇聯指出過去二十年中共農業年平均成長率不及一·五%，工業生產也只能增長六—八%，今後十年中共經濟增長年率約為六·五%<sup>⑭</sup>。中共「三中全會」再度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的一次講話中，就坦白承認大陸農村主要是靠手工勞動，「積累」水平不高<sup>⑮</sup>。本來，中共的「人民公社」較之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更容易扼殺農民的生產情緒，依靠農業為工業積累建設資金，等於緣木求魚。目前，中共仍須大量向外購糧，聯合國估計它一九七八年約須購買八〇萬噸小麥<sup>⑯</sup>。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一日澳洲小麥公團聲明，它已和中共簽訂三年長期小麥輸出契約，每年對中共輸出二五〇萬噸小麥，三年總價款達九億美元<sup>⑰</sup>。中共農業落後，正需大量外匯購糧，又何能積累建設資金？

十年規劃究竟需要多少資金呢？蘇聯廣播說，日本專家統計過，為使經濟現代化，中共要花六、〇〇〇多億美元<sup>⑱</sup>。根據其他外國專家的估計，這個數字接近七、〇〇〇億。為建設須要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投入生產的一二〇個大型機械項目，就將要花費三、五〇〇億美元。而中共的外匯儲備據估計有二〇億、最多也不過三〇億美元。（日本資料稱最多二五億美元）廣播指出，據北平的經濟人員統計，為順利實現長期經濟計劃，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八年之內，需要的國民經濟投資，相當於中共政權成立以來二十多年的投資總額。這就是說，每年應投入一、〇八〇億元。據外國專家估計，近幾年來中共的財政收入只約為七〇〇億元。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國家投資的很大一部分用於軍事部門，在這方面的花費約佔國家預算的五〇%。廣播稱，擺在中共經濟領導人面前的是極其複雜的問題，燃料、電力和原料不足的情況如此嚴重，以致不得不顯著減少低效率企業的供電量，有時因供應中斷，工廠停工，並把職工調去從事農業勞動。中共的機器和機床早已陳舊，多數大型機器製造廠都是五〇年代興建的。一九七七年參觀中共一個農業展覽會的美國科學家確信，在那裏展出的技術設備，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所使用過的<sup>⑲</sup>。從上引蘇聯資料（亦多綜合外電而來）看來，中共是錢少事多，面臨着嚴重的資金籌措和資源分配問題。

#### 四

註⑫ 美國國會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報告「毛澤東以後的中國經濟」，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第六版「外論摘譯」欄譯文。

註⑬ 轉引自莫斯科電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八日）廣播談話「中國農業現代化諾言和實踐」。

註⑭ 同註⑫。

註⑮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二日）夕刊第二面「海外一瞥」欄。

註⑯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李先念告訴日本創價學會第四次訪問團（由池田大作率領），十年規劃所需資金為一萬億「人民幣」，應折合美金六、三〇〇餘億元。

見「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廿日）第五面。

註⑰ 「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評論「四個現代化及緩和可能性」。

誠如「日本經濟新聞」所說，中共現今要依靠從外資裏吸取營養。我們得承認，最近若干西方商人，對中國大陸那個「潛在」市場頗感興趣。「潛在」這個字眼兒，似乎意味着正是由於大陸經濟落後，它才有大的發展「潛」力。這等於是說，社會經濟越原始，就越有雄厚的「潛在」發展力。這實在不成一種理論。祇是，由於西方的經濟景氣久久不能恢復，對外貿易難以振作，若干生產設備投閒置散，商人們難免把對中共的貿易、經技合作、共同開發資源等等，看作一條出路，甚至不惜冒險對中共予以若干貸款。然而，商人究竟是商人，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OECD（經濟合作開發機構）在一項報告書中，估計東歐各國到一九七七年底欠西方的累積債務會達到四二〇億美元，依其經濟實質成長率及輸出入情況推算，一九八〇年債務將達五七四億美元，加上利息九〇億美元，共為六六〇億美元。於是，西方的銀行界、進出口業人士等等，就不免有些擔心。而中共到一九八五年止需款六千至七千億美元，西方商人是不敢冒此風險，無限制供應的。

西方商人雖有若干對中共患有「過熱症」，但另有一些理智的人士，對此做過不少「冷靜的」分析。

日人小木曾功氏曾為文指出，過去十餘年來日本與中共的貿易，都是日本通產省在暗地推動，包括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共和日本簽訂的為期八年、往復貿易總額二〇〇億美元、由日本對中共提供機器設備的長期貿易協定在內。小木曾功指出那個協定簽訂的當時，日本的礦工業生產和上（一）月比較，減少了〇・三%，製造業的開工率指數為一〇九・〇，完全失業者達一三六萬人。換言之，日本的經濟係處於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雙重壓力下。不過，那個平均每年二五億美元（一般貿易以外）的長期貿易協定，對於挽救日本的經濟不景氣顯然無濟於事。

右述協定的內容，對於中共現代化之所需，顯然也是杯水車薪。經小木曾功在分析後指出，外國的中共經濟專家估計，到一九七八年年底為止，中共短期債務共計三億六、七〇〇萬美元；進口工廠設備貸款，本利合計則為一四億二〇〇萬美元。其中，應在同年內償還的，短期債務部分為三億三、三〇〇萬美元，進口工廠設備的本利合計約為四億二、二〇〇萬美元，兩項合計當在七億五、五〇〇萬美元之譜。一九七九年須要償還的估計在六億五、五〇〇萬美元左右，一九八〇年為六億四、八〇〇萬美元上下。而中共的外匯存底僅有二十幾億美元<sup>⑥</sup>。中共還要繼續向日本、西歐、美國購進包括武器在內的大量物質並接受貸款，其債台自然會逐日增高。

美國的企業家也對中共抱有幻想，希望在大陸市場分一杯羹，但自一九七二年美國與中共恢復貿易以來，雙方貿易實績不佳。一九七四年曾達九億三、三八〇萬美元，一九七七年僅三億七、四〇〇萬美元。同（一九七七）年西方在大陸市場所佔貿易比重為：日本二九%、西德八%、美國三%。一九七八年由於中共大量購買美國糧食，雙方貿易額達一二億美元，僅佔美國貿易總

註⑥

小木曾功作「通產省對中共市場的危險賭博——湧向中共市場的日本企業的美夢幻滅了，將未來寄託於中共的日本官僚們感到動搖與不安」，原載日本「文藝春秋」（一九七九年）新年特大號。引文見聯合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三日）第五版濃縮譯文。

額的○·一%，佔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對美貿易的七分之一<sup>⑭</sup>。

以往，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索（W. Michael Blumenthal）有言，截至一九八五年中共將由西方輸入一、二〇〇—一、五〇〇億美元的貨品，美國可分享一〇%<sup>⑮</sup>。不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鄭竹園教授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舉行的中美關係問題研討會中，曾就中共的外貿能力發表演講，他根據美國兩種不同的估計指出，一九八五年的中共貿易總額，大概在二四六億—二八九億美元之間，而對美貿易還有很多限制<sup>⑯</sup>。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美國商務部出版的官方工業及貿易刊物「美國商務」，已警告各商業公司對中共貿易勿存幻想，應該是可信的。

該部的資料，是在截至一九八五年美國對中共貿易的展望中，就中共經濟十年規畫期間，對西方先進貿易及資金吸進等作了一些統計。據該部「現實的透視」，到一九八五年底中共從西方輸入累計約一、二〇〇億美元，同時其外債約二〇〇億美元。總之，該部認為對：（一）中共的輸出能力；（二）中共的債務水準；（三）中共可以吸取引進技術而促進成長的能力等三種要素，必須能透澈地看清，警告民間不可對與中共貿易存有過奢的希望。

美商務部報告指出，中共為達成十年計劃目標而輸入必要的技術、設備，其每年輸入平均實質成長應確保為一五%，相應的也就要促進輸出。中共一九七八年輸出總額八二億美元，較上年增二五%。惟因：（一）西方先進國家景氣恢復遲緩，保護貿易主義抬頭；（二）作為中共傳統輸出支柱的食品輸出，其增長率將行鈍化；（三）隨着內部需要的擴大，輕工業品輸出餘力也將鈍化；（四）重工業產品的輸出，尚需時間，所以商務部預測一九七八—八五年間，中共對西方的輸出，平均每年增長率僅能維持一〇%。不過，依吾人觀察，此一成長率仍嫌估計偏高，其理由見後文。

中共對輸入貨品價款的支付能力，由於今後開發重點的石油，乃係重質油，加以中共本身精煉能力有限，作為最大主顧的日本，從一九八二年起，能否將增產部分的原油全部購進，實為極大疑問。如此，則對西方貿易赤字即將擴大。況且，現

附表三 中共對西方國家貿易與債務的展望（單位=100萬美元）

	78年	81年	85年	78—85年累計
輸入	8,500	14,100	22,500	122,800
輸出	8,200	10,900	16,000	93,800
貿易收支	-300	-3,200	-6,500	—
債務（年度末）	1,000	4,300	20,700	—
債務償付對輸出的比率	0.12%	0.39%	1.3%	—

註：(1)前提條件為：A、實質輸出增長率應保持10%（每年平均），B、實質輸入增長率保持15%（每年平均）。C、平均利率7.5%（每年平均）。

(2)來源：轉自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第五面。

註註註  
⑮⑯⑰

寺村莊治作「中國市場」，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第五面。  
同右。  
講演全文經應小瑞譯出，刊聯合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第四版。

代化本身就離不開石油，中共也就不能將所產石油大部輸出。

商務部認為，中共一九七八年輸入八五億美元，至一九八五年如增加二·五倍，即達二二五億美元；一九七八年輸出八二億美元，一九八五年可擴大到一六〇億美元。從一九七八至八五年累計，中共可從西方輸入一、二二八億美元，對西方輸出九三三億美元（請參閱附表三）。

由於依靠輸出賺取外匯有其限度，中共今後勢須以對外借款、合辦企業等方式直接吸取外資。商務部認為，當前有關這些方面的估計，也有誇大之嫌。例如，美國銀行界估計，中共從西方借入的資金、信貸，可由一九七八年的一〇億美元，增至一九八五年的三〇—三五億美元，惟商務省指出，屆時西方先進國家的過剩流動性是否仍在繼續，中共方面又不願使債務償還所佔比率過大，故上述估計失之過高。依商務部自己的估計，到一九八五年底中共債務最多為二七〇億美元，假如中共的對外借款，直接引進外資等能擴大到極限，則一九八五年末中共對西方輸入總額累計將達一、三六〇億美元，而同時的債務餘額則為二六五億美元<sup>②</sup>。按此與鄭竹園教授的估計相比，仍然是偏高的。

鄧小平訪美時，中共「副總理」、「科學委員會主任」方毅，曾在美總統專機上答覆記者所提「現時中國是否突然而廣泛地引入外國的科學技術？」問題時說：「我們並非突然地、龐大地輸入外國科學技術。在輸入先進技術時，我們將首先考慮我國的經濟負擔能力，同時還考慮是否有技術人員和技工來管理如此高度精密的科學技術」<sup>③</sup>。這些話是相當平實而少虛誇的，然而考慮到經濟負擔能力和技術管理人員，那中共輸入科學技術設備，就會有嚴苛的自我限制條件了。方毅在美被記者問及中共發展四個現代化，為何要與可口可樂達成商業協定時，曾以英語回答說：「我們希望擴大外國旅客來華訪問的數字，他們習慣飲可口可樂，但對中國人來說，我們中國人仍然喜歡飲我們的綠茶」<sup>④</sup>。由這些話更可以體會得出，中國大陸不會成為西方消費品的大量市場。

## 五

日本和中共簽訂「和約」，美國和中共建交，有多少是大公司、大企業家所促成的。中共目前也以這兩個國家為主要統戰對象（也許正是為此，鄧小平才親自出馬去訪問美日）。鄧小平在美訪問了新的經濟中心地帶，參觀了能源、太空技術、飛機以及汽車製造等等，題示了他此行也含有經濟統戰意味。不過，依美國商務部透露，美國與中共間有關今後數年的經濟商談，其已成

註② 美商務部資料，轉自「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二月廿日）第五面。

註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第一版根據該報特約記者黃天雄西雅圖六日長途電話所發表的「本報特稿」。

註④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第二版。

立或已同意的，約爲三〇億美元，包括較大的「US Steel」等的鐵礦開發與鋼鐵生產計劃（一一億美元）、觀光旅館業（一〇億美元）、波音七四七客機輸出（一億五、〇〇〇萬美元）等，另外美國石油業界也有可能與中共合作開發石油。

至於日本，據稱中共曾非正式試探，希望日本能對它提供三五〇億美元。惟在鄧小平二度訪日之前，日本政府和金融界所決定的是：(1)日本輸出入銀行爲合作開發資源，向中共提供包括直接貸款和輸出金融的融資二、〇〇〇億日元（以日元計）；(2)民間金融機關向中共提供二〇億美元（以美元計）的協調融資。稍後的「美聯社」消息稱，包括東京銀行在內的二十家日本銀行，已達成基本協議，聯合貸款給中共二〇億美元。

由此可見，鄧小平的美日之行，其經濟收穫並不如他預想的順利。此外，據日本政府方面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證實，國際輸出信用保險機構（伯爾尼同盟 Bern Union）<sup>註28</sup>於同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愛利斯召開大會，關係國家曾就對中共提供金融協助一事交換意見。由於中共的十年規劃預定向外借入數百億美元，西方先進國家爲避免融資的不當競爭，希望能締結一項紳士協定。會中多數主張對中共貸款條件應爲「與五年以下延期支付利息相同，即年息七·二五%左右」。按一九七八年四月以來，以OECD爲中心決定對開發中國家輸出：(1)延期支付在五年以下的年息七·二五%；(2)在五年以上的年息七·五%。惟因西方對中共步調不一，日本輸出入銀行對中共資源開發融資利息最低，僅年息六·二五%左右，致爲美國所不滿，要求其提高至七·二五%<sup>註29</sup>。惟中共似仍嫌日本貸款利息過高，而要挾其降低。經過此項會議後，中共獲取低利貸款的可能恐將減少了。中共今後不僅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吹噓什麼「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相反的，它必然會被債務壓得透不過氣。何況，它作爲經濟基礎的農業，正在爲歉收而大量消耗外匯購糧。至於工礦業，則由香港「文匯報」標題爲「對虧損不能麻木不仁」的「新聞雜誌」內容（詳後文）看來，其企業虧損現象還相當普遍而嚴重。如果缺少輸出的貨品，則對外貿易也就很難賺取外匯了。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一九七八年中共對外貿易總額超計劃完成，較上年增加三九%。其中輸出增二八·六%、輸入增五〇%，實際數字如何，中共不曾公布。但輸入增加比率遠高於輸出，顯然會使赤字增加。由於四個現代化所需而輸入石油勘探、煤炭開採、化肥生產、發電、石油化學、鋼鐵生產成套設備等，輸入自然會激增，例如從日本輸入的寶山鋼鐵廠設備即達二〇〇億日元，全部輸入機械達二、〇〇〇億日元（約合美金二〇億元）。中共的輸出則以原油、煤炭、鑛產品、工具、棉布、絲質衣

註25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夕刊第二面。

註26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一日）第一面。

註27 「美聯社」東京（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原係根據同日「朝日新聞」消息）電，聯合報（同月四日）第四版。

註28 一九三四年英、法、西班牙三國保險公司，以協調輸出信用保險爲目的，結成伯爾尼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政府機關加盟，日本亦經英國介紹加入，現有歐、美各國及日本等二〇個會員國。

註29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卅日）第九面。



物、食品、茶葉爲主，傳統技術的工藝品輸出也有伸展<sup>⑩</sup>，但其中不少是缺乏彈性或無法大量生產的商品，是不能長期激增的。中共自己不會透露它的貿易赤字，不過單就它與日本的貿易而言，其一九七八年的輸出入總額爲五〇億八、八一二萬美元，較上年增四五·八%，據日本大藏省的通關統計（速報），日本輸出三〇億四、九六八萬日元，較上年增五七·三%；日本輸入二〇億三、二一四萬美元，較上年增三一·三%。那麼單就對日貿易一項言，中共就有一〇億一、七五四萬美元的赤字。

中共銀行接受外國存款，也是吸收外資的方式之一。另外還有所謂補償貿易方式，就是接受外國投資以開發資源，而以將來的產品償還。在這方面，中共很可以煤炭、石油爲餌。中共的石油藏量究有多少，現今仍難確定，但它現產的石油多含蠟質，日本商人就不願接受。恰巧此時，墨西哥的油藏據說超過沙烏地阿拉伯，而其品質又遠在中共石油之上，這不僅吸引了日本商人的注意，而美國的卡特總統也親往墨西哥訪問，那會某種程度地影響美日與中共合作開發石油的計劃。在目前，中共自有的開採與精煉能力均極有限，當日本要求中共增加對日輸出以補因伊朗動亂致石油輸入減少的份額時，竟被中共拒絕，結果只是將中共輸日原油價格（FOB）由一三·二〇美元提高四%，成爲一三·七二八美元<sup>⑪</sup>。中共不乘價格上漲時增加輸出，顯係產量不足所致。至於燃料煤及原料煤，雖亦爲工業國家之所需，但其需要程度實遠遜於石油。而且，中共要求現代化，本身對石油與煤炭的需要必大幅度增加，因償債而大量輸出，當影響本身所需亦即打擊其現代化。

前述所謂貿易補償方式是將來的事，目前中共還得鼓勵服裝、刺繡抽紗、裘皮製品、竹籐棕草、罐頭、陶瓷、日用五金等七種產品出口，中共雖稱此爲重點產品和高檔產品，惟現有出口總額僅一億美元<sup>⑫</sup>。單靠輕工業品出口，是無法大量賺取外匯的。中共改變僑務政策，僑匯可能略有增加，想來也只限於接濟家屬生活，很難誘致華僑投資。中共爲現代化而債臺高築，事屬必然。以往，李先念提到中共要人民束緊腰帶以償還蘇聯債務時，曾經說中共讓俄國人吃肉，自己吃別的。又據周恩來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四屆「人大」的報告中說：「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一四億六〇〇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一三億八、九〇〇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七〇〇萬新盧布，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sup>⑬</sup>。中共當時欠蘇聯債款不多，償債尚如此吃力，則毛澤東之強調「自力更生」，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如前所述，中共十年經濟計劃就需款六千至七千億美元，到兩千年實現現代化之所需，自更係天文數字，倘使大部依靠向國外借款，則李先念等人都不吃肉，也無法償還呀！

債臺高築，償本付息的負擔就會阻礙中共經濟的繼續發展。然而，中共却說：「中國與美蘇不同，有着優越的社會制度，中

註⑩ 參閱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七日）第七面。

註⑪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八日）第七面。

註⑫ 參閱中共「中國新聞社」上海（七日）電透露之中共輕工業部長梁靈光談話。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第六版。

註⑬ 尹慶耀著「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初版，七七頁。

國與日本、西德相比，有着更豐富的物力、人力資源。中國在本世紀內接近、趕上、超過它們，是可以斷言的」<sup>④</sup>。這是真的嗎？

## 六

社會制度對經濟發展自然有其影響，那是不容否認的。羅斯陶教授在所著「經濟發展史觀」序文中說明，他從三十時代在耶魯大學攻讀時，即決定就兩個問題作專業研究：其一是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解釋經濟史，其二是經濟因素與社會及政治因素在整個社會的演變中如何配合。這些研究就構成他那本名著「經濟發展史觀」的基本內容。他甚至說他研究軍事及外交政策問題的經驗，也加深了他對經濟發展過程一般理論的瞭解<sup>⑤</sup>。在該書緒論中，著者寫道：「我應該清楚地指出，『發展階段』雖是研究整個社會的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但這並非說政治、社會組織、以及文化是建立於經濟制度之上，和被經濟制度所決定的上層建築。相反，我們一開始便認為社會是一種交互作用的有機體」<sup>⑥</sup>。

社會是一種交互作用的有機體這一觀念是非常重要的，這是說發展經濟必須還有其他的多種因素互相配合，始克奏功。

早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日本經濟新聞」有一篇關於開發戰略的文章，指出七〇年代世界經濟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南北」問題，也就是如何縮短開發中國家和先進國家間的經濟差距問題。文中把六〇年代的開發中國家按其經濟成長率的高低，劃分為三組，而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高踞A組之首。關於開發戰略的分析，該文指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單純的依靠經濟條件，其他政治、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制度、習慣等等非經濟因素，也有強烈的影響力。文章認為開發中國家的土地改革、農業現代化或「綠色革命」的推行，是經濟成長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這方面，不待筆者指明，我臺灣地區居於先導地位，是衆所公認的。

關於工業化的程序，文章更以高成長的臺灣地區為例，說明首先是把投資重點，分配在紡織、食品、電機等與開發中國家勞動力的質和資本的量相吻合的產業部門，再逐漸把重點移向鋼鐵、機械工業等資本密集的產業部門，這種階段性的發展方式，和注意培育輸出產業，是開發中國家最有利的工業化模式。

該文又稱，政府放寬對生產活動的直接干預和統制，政府投資集中在社會資本的充實方面，除了像製造業那樣必須依存於市場結構者外，對確保投資效率困難的領域，即聽任其自由競爭，（臺灣地區）這種體制明顯地促進了經濟成長。

註④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七日）第二版「時述述評」欄「中國科技現狀與目標」。

註⑤ 羅斯陶著饒餘慶譯「經濟發展史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今日世界」社（一九五二年四月）初版，原序，七—八頁。

註⑥ 同右，一七一—一八頁。



文章說，爲了提高勞動力的質以謀產業現代化，教育的普及是絕對必要的。一個開放性的社會經濟體制，能够促進輸出以提高經濟成長率，也是極其明顯的<sup>②</sup>。如此說來，九年國民教育的推行，便於接受現代化生產技術，也就是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了。

右引文章，恰巧爲羅斯陶教授的理論列舉了事實的例證，也剛好映照出中共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條件，阻礙了它現代化的可能。

中共說它的社會制度優於美國，固然不值一駁。說它優於蘇聯也很費解，因爲它們都是作爲馬列式共產主義社會之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依吉拉斯的說法：「共產主義國家中這種所謂普遍地無條件地優越的所有權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和馬克思主義在實行上最重要的神話。……它到現在還對那些黨官僚有好處，他們用這種神話來取得權力之後，又用之來保持權力」<sup>③</sup>。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是兩層建築，也就是羅斯陶教授所說的經濟制度（基礎）和上層建築。在革命時期，共黨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反對用政治、法律的力量改善經濟制度；在奪取政權後，共黨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上層建築的作用特別巨大。……馬克思主義不但認爲上層建築是以經濟基礎爲轉移的，同時還竭力強調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發展的巨大的積極的作用」<sup>④</sup>。這顯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統治者要以意識形態、政治與法律的力量，來支配社會經濟。吉拉斯說：「在共產主義國家裏，黨官僚們以公正和於法有據的外衣來掩蓋其對於財產的擁有與掠奪」<sup>⑤</sup>。這些話正確地揭穿了上述事實及其結果。

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制度方面，是全民所有制（實係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制；在經濟營運方面是計劃經濟。由於共黨國家的經濟是公有公營，全國的工農生產企業，都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擬頒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資金、設備由國家供給，原料及產品價格由政府規定，每一企業單位所生產的品類、數量以及供銷關係，員工人數、薪資多寡等等，均由中央計劃詳密記載（故稱中央計劃經濟），以行政命令（故又稱命令經濟）下達至各生產單位，企業領導人不得變更，當然也不負盈虧責任，僅止率同員工照計劃行事，只要完成計劃指標，不論其品質如何，都可領取規定的獎金，超額完成，則可領取超額獎金。這是一個浪費而缺乏效率（甚至製造大量廢品）的制度。

中共的經濟制度本係學自蘇聯，文革以來，由於打擊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反對專家治廠，強調工人階級領導等等，使

註②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經濟教室」專欄「開發戰略的不同」。

註③ 吉拉斯著葉蒼譯「不完美的社會」，香港「今日世界社」（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七六頁。

註④ 羅森塔爾（M. Rozenat）·尤金（P. Yudin）合編「簡明哲學辭典」，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版「基礎和上層建築」條，四八五—四八九頁。

註⑤ 「不完美的社會」，七七頁。

原有的經濟制度遭到干擾與破壞。當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重提四個現代化後，鄧小平即草擬「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文件時，被「四人幫」指為宣揚科學技術至上、修正主義規章制度萬能，斥為反對依靠羣衆，主張「管、卡、壓」，重搞「條條專政」，而鄧小平也第二次被打倒。「四人幫」垮台後，中共又開始制訂條例規章。在如今崇洋風氣盛行時，所謂經濟立法可能有些新花樣。但要注意的制度、機構大都原封未動，而當權的鄧派人物，也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解放幹部」，過去的觀念、作法，仍然佔有統治地位，它不會變成自由經濟，是不能以西方的概念去推測的。

中共仍然在政治上反蘇修，但鄧小平的經濟路線已和蘇修差不多。蘇聯從六〇年代中期就倡行經濟改革，而其效果不彰，其原因衆多而複雜，最主要的仍然在制度本身，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放棄，這個制度下的官僚主義與官僚階級，就是改革的一大阻力，不能鼓舞創意、責任心和生產情緒，也是制度上的先天弱點。要提高經濟效率，就要改變中央集權的計劃制度，那一批計劃官僚，豈不要恐慌？把經濟權力下放到地方或廠礦，那裏的領導人責任陡然加重，他們能否適應或樂於接受？要講求企業利潤，首先要裁減冗人員，有些員工豈不要失業？機構、制度、觀念……能否彼此契合，同步改革？在在都是問題。

吉拉斯說得比較透澈，他說他在寫「新階級」(The New Class)一書時，以及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一年在獄中時，就曾想到在共產主義下的所謂社會主義所有權是一頭怪物，是共產主義各種失敗的根因，也使其陷入迷途而不易挽救。吉拉斯說他從馬克思的教訓和他自己的革命經驗裏，得知統治集團和勢力之所以抗拒任何轉變，主要的原因是恐怕轉變會使他們喪失經濟上的特權，恐怕那種使他們可以享有各種物質利益的所有權形式會被摧毀<sup>④</sup>。

吉拉斯指出，共產主義所有權在形式上是社會的和國家的，但在實際上則由黨官僚來管理和操縱<sup>⑤</sup>。這讓我們想起，西方人士以為共黨國家社會經濟進步的結果，會使它成爲專家政治。這種說法或許有部分是對的。不過，這些經濟和技術專家，也正是既得利益階級，並不願從事改革。他們也許本身還是黨官僚，即使不是也得受最高黨官僚的控制和支配。撇開這一切不談，經濟制度還是最後一道大關，是不容易突破的。還是讓我們再引用吉拉斯的話罷。他說：「改革的目標並不壞，如注重利潤，與世界市場聯繫，資本和商品自由轉移，貨幣可以與外幣兌換，以及加強管理效率，節省行政經費等等；但在實行上，人民却並沒有認真努力來使改革成功，因爲舊的政治和行政機構還是原封不動，所有權制度也沒有變更，換言之，它仍是由黨官僚壟斷和控制。<sup>⑥</sup>」須知吉拉斯這段話，是指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而言。據說中共在某些方面要效顰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成效並不大，經濟依然困難，中共的改革成績，真能青出於藍，勝過老牌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嗎？

註④ 同右，八一頁。

註⑤ 同右，八三頁。

註⑥ 同右，八四頁。

吉拉斯說共黨國家的性質，就是一黨制和黨官僚壟斷經濟<sup>④</sup>，那是很正確的。共黨國家的官僚機構真是龐大無比。「新華社」曾播發該社記者從基層採訪時的來信，主要是批評「官」多不好辦事。據說，中共各級領導機關和部門當官的太多，是一個嚴重問題。以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為例，文化大革命前，旗、縣的書記、主任共有六十五個，現在增到九十六個。公社本是基層組織，書記、主任有兩、三個也就夠了，可是現在好多地方達到了一個「班」。五原縣所有公社的書記都在十名左右，有的達十二名之多<sup>⑤</sup>。基層是如此，中上層也不例外，單就中共「國務院」的副總理而言，即有十四名之多。官多必然會滋生權責不明、你推我拉、效率低落的官僚主義。因此，香港「文匯報」就以「當官者多不好辦事」為標題，報導了那封來信。該報另一則「新聞雜誌」的標題是「發展科研有『伯樂』」<sup>⑥</sup>，那就意味着上級官多却未必懂，沒有慧眼識才，也沒有適當的升遷制度，其影響也是深鉅的。

前面提到過「文匯報」上有「對虧損不能麻木不仁」這回事，在這個標題下的「新聞雜誌」中透露，中共的經濟戰線，常常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現象，明明是虧損嚴重，但是有關領導却聽之任之，甚至有意地欺上瞞下，違反規定，製造虧損。它指出上海的七寶酒廠，過去十一年，總共少出了幾百萬打酒，浪費了糧食一千四百萬斤，足夠這個廠三百多個職工吃一百年。而主管部門為了產量增加，還不斷供應糧食給這間不能賺錢的小廠。又說，秦皇島市有關負責人批准興建一個小高爐，一次購進二萬噸礦粉。實際上，這個小高爐一年僅耗用四千噸礦粉，而買礦粉的款項向人民銀行貸款，造成了資金和物資大量積壓，破壞了社會生產。「雜誌」還提到一些企業競發獎金和津貼，互相比着幹，以發的獎金多為榮，以致一些商業部門利潤下降，甚至虧本。

該報所列舉的，不過是九牛之一毛，也許還有打蒼蠅不打老虎的避重就輕之嫌。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指出的「麻木不仁」的原因。它說，原因之一是在中共在評價企業領導幹部功過時，往往只用政治標準，不用業務標準。當中央推行某種政策方針時，幹部為了自己顏面好看，都愛趕潮流，不計經濟上的得失利害。上面說發獎金，下面就以多發為榮。原因之二是有些主管部門考核經濟生產，只追求產值，不計算成本，給了企業領導「走法律罅」的機會。同時，對於浪費資金的壞人壞事，沒有檢察和處分的法律，使企業領導有恃無恐。原因之三是商品生產不講商品價值規律、市場規律，吃「大鑊飯」。企業工人羣衆、企業領導同降低成本、企業盈虧沒有利害關係，對於盈虧問題毫不緊張<sup>⑦</sup>。

以上的敘述，應把「有些」二字刪掉，因為那是極為普遍的現象。這是制度使然，也是官僚主義的表現。蘇聯就是如此，而

註④ 同右，八五頁。

註⑤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第六版。

註⑥ 同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第六版。

註⑦ 同右(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第六版。

中共的社會制度也並不比蘇聯「優越」。它却比蘇聯更多面臨了一項嚴重的困難——如何處理毛澤東的「遺產」！

## 七

一九六四年左右，毛澤東爲了對抗劉少奇、鄧小平的走資路線，提出「農業學大寨」和「工業學大慶」的口號，那是政治掛帥、要人民自己出錢出力的「自力更生」方式。華國鋒在五屆「人大」報告中說：「我們要發揚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努力工作，保證到一九八〇年把三分之一的企業建成大慶式企業，把三分之一的縣建成大寨縣」。中共新領導班子也曾數度召開「學大寨」、「學大慶」會議，且曾宣稱已建成四〇〇個大寨縣，十個「大慶」已具輪廓。而今，有關此一方面的宣傳忽然沉寂下來。大寨由紅變黑，大寨英雄、爬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地位的模範農民陳永貴受到大字報批判，被指爲「四人幫」在農業方面伸出來的黑手<sup>④</sup>。大慶油田也遭到指摘說，這個規模巨大的企業，在生產管理上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的落後狀態，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式，對生產的指揮權統得過多過死，基層單位沒有經濟權力，也沒有經濟責任，吃「大鑊飯」的思想比較嚴重，人力、財力、物力在某些方面有相當的浪費<sup>⑤</sup>。看來，毛澤東發展工農業的兩大樣板發生了麻煩，然而整個大陸衆多的大慶式企業、大寨縣如何處理，豈不是一大問題？

毛澤東提倡「人民公社」自辦企業，要中小企業遍地開花。這些企業設備簡陋、技術落後、耗費勞力與原料，而產品成本高、品質低，原是反現代化的措施。但據蘇聯資料透露，目前這些小型企業生產的產品佔中共工業總產量的約二分之一，僅在一九七一一七七年間，生產化肥的小型企業的比重從五〇%增至六〇%，生鐵從二五%增至二七%。目前，小型企業生產三分之一的煤炭和電力。小型企業產量增加意味着一整套工業生產部門減低了技術水準，減低了勞動生產力和經濟效率。與此同時，減低這些部門的產品質量。蘇聯資料又指出：目前在社隊興辦的企業中，工人人數佔全國三六%以上，但這些企業的基金只佔全國三%。這意味着，這些企業的生產完全經由手工勞動，沒有先進技術和先進工藝，在生產中沒有科技成就，因而產品質量低，不符合世界先進標準。蘇聯電台是在批評中共工會「九大」所提高產品質量的任務時，才透露了上述資料，那原也是中共報刊、廣播所零星透露的。爲了工會提出的任務，中共報刊不斷呼籲「在長時期內狠抓質量工作」，中共還特別舉辦了「質量月」。恰在此時，蘇聯就故意透露那些資料，並且指出，中共的先進企業之一的鞍鋼，迄今在十六種鋼產中只恢復了七種，其他企業的情況更壞。又說，中共自己也報導，一些工廠產品不符合起碼要求而被迫停產，廣州拖拉機廠即其中之一。該廠自一九六六年建廠以來，沒有生產過一臺完好的拖拉機<sup>⑥</sup>。先進企業尚且如此，依靠中小企業無法現代化。可是這些亂糟糟的事務如何處理呢？一刀砍

註④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第四面。

註⑤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

註⑥ 莫斯科電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評中共工會「九大」提出提高產品質量任務。

掉，大陸的工業產品立刻會起恐慌，而大批職工如何轉業，豈不是更大的問題！

須要處理的毛澤東遺產或者說是文革的後遺症，還有一些是意識形態、路線或作風的問題。從「人民日報」文章標題「克服小生產思想搞好專業化協作」<sup>⑤</sup>看來，就是在規模較大的生產事業中，也還瀰漫着小生產思想，要糾正前述中小企業遍地開花的現象，從心理上就存在着嚴重的障礙。

過去在「四人幫」時代，共幹們以「土皇帝」的姿態，執行「土政策」，不僅在作風上作威作福，在生產上也「瞎指揮」。為了實行「以糧爲綱」，安徽省定遠縣嚴橋公社紅崗大隊，強迫農民把黃豆、花生等作物犁掉，把種植水稻的面積由八〇萬畝硬擴大到一五〇萬畝。而且，從水稻品種的選擇、密植的規格，以至栽插時間都硬性規定，不許有任何更動，以致有些本不適合種植水稻的地區，幾乎是顆粒無收<sup>⑥</sup>。中共新當權派要改變這種作風，但由於其根深蒂固且普遍於整個大陸，迄今仍在反覆申令共幹不許「瞎指揮」，可見那種現象依然存在。我們可隨便列舉幾項共幹抓權、社隊無權的例證如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短評，還在要求尊重「政策、法律」所給予（人民公社）社員的權利；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四日「人民日報」社論以「切實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權和自主權」爲題；同年一月廿五日「新華社」記者來信強調「抓好社員的現金分配兌現」；二月廿一日「新華社」報導上海川沙縣最近才廢除不許社員養母豬的禁令；同一天該社又報導吉林德惠縣學習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後，才聯繫實際，採取社、隊「四自主」的措施，解決領導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這裏有些是中共特別提出的典型先進事例，希望其他社隊仿效推行。由此可體會到大陸農業生產問題，是並不容易改善的。我們必須指出，這些不能完全歸咎「四人幫」，有多少是應由共黨的制度負責的。至於直到最近，還有「火燒資本主義」<sup>⑦</sup>的現象存在，那就只好由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負責了！

瞎指揮與嚴格限制不限於農業方面，其他工礦事業亦復如是。因此，直至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還在呼籲「必須擴大企業的權力」（標題），且重行引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所說：「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領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可是，如前所述，經濟官僚是不願將權力下放的，這件事的阻力就在中共制度的本身。再者，想到從文革到現在，中共內部經過幾次翻來覆去的路線鬭爭；想到中共現有的三、六〇〇萬黨員，大部分是文革時期入黨；想到中下級幹部所受的「四人幫」

註⑤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評論員文章。

註⑥ 「新華社」文章「從定遠縣農業增產看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見該社（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合肥電。

註⑦ 海南島東方縣板橋公社荒地盛產茅草，割茅草是生產隊的副業，也是農民的家庭副業。惟共幹不願見農民私有茅草，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晚決定「火燒資本主義」，放火將農民茅草統統燒光。嗣經「南方日報」刊出通訊，標題即爲「火燒資本主義」。參閱中央日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第九版簡要報導。



影響等等，要改變中央計劃制度下的權力集中，要引進資本主義式的經營管理制度，那可是談何容易！積極反抗者、消極怠工者、躊躇觀望者，都將成爲現代化途程中的絆腳石。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新華社」報導，參加四川省委擴大會議的部分地、市、縣委領導幹部認爲：要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必須掃除各級黨委某些領導同志思想上的主要障礙——「恐『右』症」。他們指出，「恐『右』症」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老怕犯「右」的錯誤，來了運動老怕戴「右」的帽子。越「恐『右』」，在思想上就越離正確路線越遠，在實踐上就違背客觀現實越嚴重。

「恐『右』」是一個普遍現象，因此「人民日報」曾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八日發表余思署名的文章「恐右症的來歷」，批駁「左」比右好論。由於中共政策路線不斷左右搖擺，執行的幹部們無所適從，今天對的明天就可能是錯的，今天有功的明天可能就有罪，他們爲求自保，不得不有所保留。這樣一來，上級經濟官僚不願將權力下放，下級執行幹部不敢過分「民主」，那個開放型的現代化路線就很難實現了。

如前所述，提到它比日本、西德有更多的人力資源。我們也知道某些熱中於與中共經濟合作的人，聲稱中共的中小學教育普及、人民具有勤勞刻苦的習性。這是完全忽視了文革時期中共各級學校停課鬧革命和其後對於教育制度破壞的影響，也無視了中共的經濟制度早已摧殘了中國人民勤苦耐勞的德性這一事實。目前大陸上所有的已不是日人所說的優「質」勞動力，而只有不能充分就業、「吃飯問題」還不會「過關」的過剩人口，那對於現代化是沒有好處的。

日本法政大學經濟學教授大島清，曾經給他在北平的朋友寫了一封信，他對中共的現代化是站在贊成的立場的。但他指出中共和日本不同，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就步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路線的後塵，在若干領域中不僅趕上甚且超過了歐美的水準，那是由於日本也是資本主義體制，學起來比較容易。中共所追求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要學習日本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經驗，就會面臨全新的、意想不到的複雜問題。他舉例說，日本的汽車工廠，其生產核心之大工廠下面，還有一系列生產部分品和零件的中小企業，直接、間接、再間接接受大工廠的訂貨。中共僅把大工廠的成套設備移植到中國大陸，其組件、配件等又該如何？大工廠並不生產這些東西呀！他建議把中共的社隊工業和這些大工廠相配合，但指出那須在確立企業自主權的同時，更要在工廠內部徹底實現民主<sup>⑤</sup>。他所指出的中共現代化的困難是正確的，但他提出的建議却很難實現。因爲那牽涉到制度、觀念、作風、資金、設備以及勞動力的「質」等衆多問題。

## 八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閉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把發展經濟擺在優先地位，其公報中的重點爲：從一九七九年

註⑤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夕刊第五面。

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也可說是正式進入經濟建設期；同時不容許再有損傷安定團結的政治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對「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隻字未提。不過，據「人民日報」透露，今明兩年中共的經濟仍然處在調整期。

「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當前在克服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比例失調的一系列調整工作中，首先要抓農業搞上來，需把工業生產的短線煤、電、運輸、建材搞上來，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急需如住宅、校舍等建設搞上去。爲了積累資金，引進先進技術，加快建設速度，還要注意發展收效快、利潤大、能創外匯、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行業」。又說：「爲了給四個現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礎，更好地實現七年和二十二年的規劃，今明兩年仍然是恢復、調整、整頓時期。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今後的大發展作好充分的準備，我們要一面調整，一面前進。」所謂調整的重點，就是把發展農業提到首位，把鋼的投資比例相對縮減。該社論指出，「以鋼爲綱」，決不是任何時候都要遵循的客觀經濟規律。又說，多年來，中共投在鋼上的財力、物力、人力比重很大，但是見效很慢。一個重要原因是鋼鐵工業孤軍突出。有的鋼鐵廠建起來了，但是燃料、動力等協作配套條件上不去，發揮不了作用。所以，鋼的投資比例要相對縮減，而且要認真總結多年來鋼鐵生產建設上經濟效益不好的經驗教訓<sup>⑤</sup>。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二日，中共宣布中止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來，與日本各公司簽署的二十二項購買日本工廠設備的合同。此舉使日本政府及商人深感震驚。據悉，從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中共與日本業已協議的契約共七、五〇〇億日元（約三、八億美元弱）的輸入總額中，約四、二〇〇億日元予以保留，其餘三、三〇〇億日元則已正式簽約。被保留的重要工廠設備輸入如表四：

中共突然採取此項措施的原因，各方多有揣測。日本政府方面的見解，認爲不外：（一）關於支付條件等等，日本與歐美相競爭，中共乘機爭取本身利益；（二）日本輸出入銀行對中共延期支付融資、外匯銀行的銀行借款等條件，日方尙未研究，中共想施加「壓力」；（三）爲實行現代化，中共從日本、歐美緊急輸入，本年度外匯支付達一五億美元強（外匯存底二五億美元左右），致感外匯拮据；（四）受對越戰爭等政治影響<sup>⑥</sup>。

爲探求真相，日本的「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爲新日本鋼鐵公司會長稻山嘉寬）特派其理事長渡邊彌榮司前往中國大陸，曾會見中共「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劉希文、「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顧明，據中共方面聲稱：（一）對日政治、經濟政策不變；（二）暫時凍結輸入，是有關支付準備資金的技術性問題，要儘早圓滿解決，並非廢棄契約；（三）爲解決資金問題，將盡力向日本、歐美各國政府及民間爭取貸款。渡邊於三月二日夜返日後對記者談稱：（一）由於資金上的理由，中共現代化有延遲及縮小規模之慮，因而急求對外借款；（二）中共解釋凍結契約並非受美中（共）正常化、歐洲接近中共市場乃至中（共）越戰爭等影響，完全是準備不足的

註⑤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廿四日）社論「解放思想，搞好綜合平衡」。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第五面。



附表四 保留契約生效期的主要工廠設備輸入項目(單位:億日元)

設備名稱	成約金額	簽約契業	草約年月
上海寶山鋼鐵廠有關設備	2,000	新日本鋼鐵公司	78.12
乙烯工廠設備	800	東洋工程 伊藤忠商事	79.1
煉鋁工廠設備	300	日本輕金屬、 伊藤忠商事	79.1
尼龍·橡皮軟線製造設備	140	旭化成、旭工程 、蝶理	79.1
合成甘油工廠設備等	100	日揮、三菱商事 、旭電化工業、 旭硝子	79.1
減壓殘油熱分解設備	90	千代田化工建設 、和光貿易	79.1
丁二烯橡膠工廠設備	25	三菱重工業 日本貿易	79.1
樹脂酸製造設備	65	日本觸媒化學 日商岩井	79.1
氫裂解工廠設備	150	日揮、專工物產 、伊藤忠商事	79.1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1979年3月1日)第五面。

問題；(三)中共四個現代化內容雖無改變，但已承認重視農業、輕工業之必要；(四)凍結事件非因日本資金協力不敷，乃因為了現代化，中共各部競相輸入物質，而從外國銀行引進資金過於遲緩，以致不能配合所致<sup>57</sup>。

另據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李先念對該報總編輯表示，由於他和「部分同志」性子太急，以致使中共的十年經濟規劃龐大得不切實際，現正加以修改，包括可能改變一九八五年的鋼產目標六、〇〇〇萬噸等<sup>58</sup>。

總括中共人員所提解釋，不外計劃太誇張、輸入物資多、外匯短缺、引進外資不如理想，因而不得不將對日協議的若干契約保留。這些方面的困難是千真萬確的，但戰爭對於經濟的影響乃至內部的路線與權力鬭爭雖隻字未提，却不能說那些因素並不存在。按周恩來重提四個現代化，鄧小平等就大量購進機器設備，使一九七五中共對外貿易激增，同時也欠債纍纍。「四人幫」乃緊急煞車，並掀一場路線鬭爭，終至鄧小平再度下台。這次凍結對日契約，幾乎可說是舊戲重演，只是毛澤東已死，「四人幫」已垮而已。據日方報導，現今主持四個現代化的總指揮是鄧小平，綜攬全局負責長期計劃的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負部門責任的是「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擔任財政金融)、「經濟委員會」主任康世恩(負責短期計劃)等，他們都是鄧派的「副總理」<sup>59</sup>。對越戰爭當然也是鄧小平決定。戰爭受挫，經濟計劃失敗，鄧小平即使不致第三次失足(當然也不敢言必)，他的權力、地位及其現代化路線，會不會受影響，豈非重大疑問？

註<sup>57</sup>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第七面。

註<sup>58</sup> 「美聯社」東京(五日)電，聯合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第二版。

註<sup>59</sup>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第五面。

四個現代化計劃原本重視重工業的建設，集中力量發展電力、燃料、交通運輸等等。如今又重視農業，縮減鋼鐵等重工業的投資。這一改變，豈不就意味着原來計劃的失敗？

農業本是共黨國家之癌，以蘇聯論，它的農業投資，一九一八—一九六五年共九七五億盧布。一九六六—一九七五年共二、一二〇億盧布。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總投資額一、七一一億盧布，計一九七六年三二一億盧布，一九七七年三二九億盧布，一九七八年三四四億盧布，一九七九年（計劃）四七五億盧布。一九七八年蘇聯有農業專業人員一六〇萬人，機械操作人員四二二萬五、〇〇〇人。農業機械方面，一九七五年蘇聯有拖拉機二四〇萬二、〇〇〇部，總動力一億六、三〇〇萬馬力；穀物聯合收割機六八萬五、〇〇〇部，載重汽車一四四萬二、〇〇〇部，總載重量四七三萬二、〇〇〇噸；一九七五年蘇聯單位面積施肥量每公頃三三〇·五公斤；化肥生產在一九七八年為七、九〇〇萬噸，一九七九年（預計）八、五六〇萬噸。但是，蘇聯的穀物產量極不穩定，還時常需要向國外購糧。在蘇聯，農業部長是最短命的，常常會因農產歉收被迫下台。誰又能說它的農業成功呢？反觀中共，就其農業資金、人才與技術設備等等而言，又與蘇聯有霄壤之別了，它的成功可能何在呢？

中共也提到改善人民生活，甚至實行物質鼓勵。一九七八年蘇聯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一六〇盧布，國營農場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一三五盧布，而集體農莊農民一九七九年（計劃）連同現金及實物合計，每月平均一一六盧布。與西方相比，蘇聯仍然是低工資政策，農村的物質與文化生產，更較都市落後，它構不成物質鼓勵，其經濟改革也尠有成效。在這些方面，中共還不能望蘇聯之項背，它更無物質鼓勵可言。

## 九

叫嚷了很久的現代化，真正開始了嗎？沒有。甚至連鄧小平自己，也直到在日本參觀了「日產汽車廠」，才曉得什麼叫現代化。十年經濟規劃過去了三年，才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六日邀請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會長大來佐武郎到大陸，去協助安排解決這個規劃中運輸、電力供應等落後部門，以及規劃中的若干缺失，並對整個規劃加以矯正<sup>註⑥</sup>。至於到兩千年時的現代化之具體計劃如何呢？據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日至廿六日訪問日本的中共「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說，現代化的具體計劃，事實上尙未擬妥藍圖<sup>註⑦</sup>！而且，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進兵越南，無疑對其現代化計劃將為一大打擊。同一天，中共就取消了它和日本共同開發渤海灣海底石油的談判，跟着凍結了同日商之間總值二一億美元、工廠設備的合同<sup>註⑧</sup>。寶鋼的建設、武鋼的擴建，都無限期

註⑥ 同右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七日）第二面。

註⑦ 中央日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第二面，原係日本「讀賣新聞」（同年一月卅日）所報導。

註⑧ 中央日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廿八日）第二版，原係日本「產經新聞」（同月廿七日）所透露。

延期。目前，中共正大幅度修正其經濟計劃，就算它可於調整之後再度出發，但十年計劃還有七年，而現代化的限期也只曠二十二年了！

美國、西德乃至法國，都不準備出售武器給中共，英國原定售給中共的獵犬式飛機，也因新越戰而終止<sup>⑤</sup>。中共的國防現代化就更渺茫了（國防現代化本來就會影響其餘三個現代化），而一次對越進攻，更使中共周圍佈滿了敵對的勢力與不信任的眼睛。至於工、農業的現代化，也將因日本及其他西方對中共貿易與貸款較前更加慎重而增多了困難。至於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那就更不容易了。

前引大島清教授的信中曾經說：所謂「現代化」，就是將最新的科學技術應用在生產與交易各個領域，以提高生產力之謂。而「人民日報」承認中共工業、交通、基建等戰線的生產技術裝備，大多是五〇年代的水平。北平電台承認其經濟發展水平在許多方面落後十至十五年，個別部門落後更遠。

中共最近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科研工作會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一九六六—一九七七）中，林彪、「四人幫」嚴重摧毀了高等教育事業。大學整整五年不招生，高等教育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大倒退，至少少培養了一〇〇多萬名大學畢業生和兩萬名左右的研究員，造成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他們把大批高等學校拆、併、遷、散，大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遭到破壞，特別是農林院校的教育瀕於崩潰<sup>⑥</sup>。試問，這項損失如何彌補得起來？目前，中共選派出國留學的人數不多，且大多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更實施「史無前例的辦學辦法」，在中學裏按文化程度分快、中、慢班上課<sup>⑦</sup>。這非百年樹人的辦學之道，且無法應現代化科技人材之所需。但中共不得不採取此種「大躍進」的教育方式，主要原因是「時不我與」。

中共內部只有暫時妥協，並未真正安定團結，隨時還可爆發權力鬭爭。而缺少一個安定的社會，現代化就無由進行。鄧小平派雖佔優勢，其現代化路線和其當前「崇洋」的作風，也並未為其全體幹部與黨員所接受，鄧派及非鄧派而支持現代化者如：葉劍英（八一）、鄧小平（七五）、李先念（七四）、徐向前（七七）、聶榮臻（八〇）、韋國清（七三）、許世友（七三）、烏蘭夫（七三）、陳雲（七四）等等，都已垂垂老矣！他們無法使四個現代化在自己當權時實現，在他們之後的當權派，是否仍然認真執行這個現代化路線，也大大值得懷疑。

就經濟發展與現代化而言，二十二年是太短了。但就中共當權派的國際及內部處境言，二十二年又太長了。人民的反抗，派系的搏鬥，國際局勢的變幻，可發生影響而打擊其現代化的因素太多。時間乃是中共不容易對付的另一大敵！

註<sup>③</sup> 新生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第四版。

註<sup>④</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第六版。

註<sup>⑤</sup> 同右（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第六版。